

學林漫錄

三集



学 林 漫 录
三 集

中 华 书 局

封面题签 顾廷龙
封面设计 谈冰玉
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学 林 漫 录
三 集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1/32·5 1/2印张·150千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 14301—17300册 定价: 9.00元

ISBN 7-101-01733-9/I·286

编·者·的·话

把《学林漫录》办成学术“窗口”

《学林漫录》的出版,在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初集出版不久,书店里就不易买到,出版社收到许多来信,要求办理邮购。编辑部也收到不少相识和不相识者的来信,称许《学林漫录》为别具一格,新颖可喜。这无疑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

在初集的“编者的话”中,我们曾说:“我们采取书的形式,不定期出版,稿件多就多出,稿件少就少出。”在我们最初的设想中,这样的书,一年编两本也就差不多了。但实际情况却打破了原来的估计。初集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发稿,同年六七月间出书的;接着,二集于九月发稿,而仅隔数月,现在是十一月,又要发第三集的稿了。作者与读者的寄赐佳作,使我们对继续办好这一书刊更有信心。

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近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子,不作姿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我们不敢保证初集至三集的文章能篇篇如此,但相信至少有一大半是读者所爱读,并且是读后有所得的。

读者可以看到,《学林漫录》第三集的内容,比起已出的两集来,有所变化。这个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本文的题目

所说，把《学林漫录》办成一个学术“窗口”。窗口是眺望窗外的景物的，人们站在高楼上，从窗口眺望远近，景色俱收于眼底。我们也希望海内外的读者，从《学林漫录》这一窗口，能对国内文史研究的情况及时有所了解。具体说来，今后我们拟增加这样一些内容：

一、在一些专文中，我们想陆续刊登某一学科或某些学术领域研究情况的综述。这一集刊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广达同志记述唐代禅宗传入吐蕃及敦煌文书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所谈的问题虽然专门一些，但提供了不少材料，对研究者是有启发的。我们希望，这样的文章，既回顾过去研究的成绩，也能略谈其经验与教训，指出今后发展的方向。当然，这绝非什么居高临下式的学术总结，它只不过是以一个普通研究者的身份，谈谈他所了解的这一方面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某些见解，供友朋参考。此外，我们将用适当的篇幅介绍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还拟刊登一些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稿，如第三集关于意大利学者利玛窦的两篇文章，就是如此。

二、专辟书评与书讯一栏，对近期内出版的文史哲古籍及今人的学术专著，加以评介，有时则介绍出版社的一些计划和打算。

三、专辟文史哲研究工作者简介一栏，每集介绍五六人、七八人不等。当今从事文史哲研究的，有些是前辈老先生，不少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中青年学者。读者很想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包括简历，研究范围，有过哪些论著，今后的研究方向，等等。从第三集起，我们连续刊登这一方面的介绍，藉以交流学术情况，活跃学术空气，并加强出版社与著作者的联系。除了介绍老一辈的研究者以外，我们拟着重介绍中年学者，他们是当代学术行列中的骨干。这些介绍以提供基本事实为主，不事虚张，不尚浮夸，希望取得各地研究者的支持和合作。

四、每集刊出“古籍与学术著作书目”。这一书目由版本图书

馆的同志们所编，他们具备优越的客观条件，掌握全国各地的书籍出版情况，我们相信这一书目是详尽而可靠的。这次刊出的是一九八〇年一月至六月，下一集则是一九八〇年七月至十二月，以后我们定期公布，以供读者了解全国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出版概况。

另外，我们拟利用书末和文间的空白，多刊登一些书籍的广告。由于时间匆促，这一集只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我们也希望与兄弟出版社合作，准备提供篇幅，刊登其他出版社所出的文史哲古籍和今人学术著作。应当说，书籍的广告主要不是商业活动，而是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方便，并且是从另一角度显示我们在整理和研究祖国文化遗产中的成绩和繁荣发达的景象。

我们希望从以上所说的这种种方面，构成一个窗口，藉以眺望正在发展中的我国文史研究的现状。这项工作光靠编辑部的几个人是不够的，我们期望各地研究者的积极合作和大力支持，为我们撰稿，向我们提供情况，不断向我们提出改进的意见，使这本小书在文史研究界中能起到它一定的作用。

目 录

“万木草堂精神”及其他	柯 安 (1)
吴瞿安先生二三事	袁鸿寿 (7)
我的语言恩师罗常培先生	侯宝林 (11)
怀念游国恩先生	吴小如 (16)
略记孙诒让的玉海楼藏书	杨渭生 (24)
坚净居题跋	启 功 (30)
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	张广达 (36)
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	宁 可 (59)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	詹 锳 (67)
试谈中国雕板印刷术的发明	李致忠 (71)
吴敬梓逸诗初考	周德恒 (79)
利玛窦及其译著	谢 方 (86)
李贽与利玛窦的几次会见	钱 杭 (92)
书评与书讯	
正在编纂中的《中国历史大辞典》	石 迅 (98)
整理出版唐代史料计划简介	伯 隆 (100)
略谈《古小说丛刊》的辑校工作	程 弘 (104)
荐《论衡注释》	萧 良 (109)

《周易尚氏学》出版(29)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简介(35) 一套古代农民战争史料(58) 一部研究话本小说的专著(70) 《全唐诗》重印出版(91) 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工具书(133) 资料完备的《戴震文集》(146) 吴晗同志和《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64)

读史零拾

“捉不良”与“不良”赵宁伊(115)
《史记》表中的倒文李解民(118)

古籍丛谭

张邦基与《墨庄漫录》葛兆光(127)
《水东日记》杂谭魏连科(134)
《千家诗》琐话冀勤(138)

文史哲研究工作者简介

史念海(142) 启功(143) 李学勤(144) 裘锡圭(145) 张广达(145)

古籍与学术著作书目(1980.1—1980.6).....(147)

“万木草堂精神”及其他

柯 安

清末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一个出生在南海，一个出生在新会。既是同乡，又是“同志”。以科第而论，梁启超于1889年中举，而康有为则是到1893年才考中举人，但康、梁却是师生关系。不管后人对康、梁的是非功过作怎样的评价，他们所受的毁誉是怎样的不同，恐怕谁也难以否认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起过震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凡是讲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都不能不提到康、梁的名字。倘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暗夜黎明之前，思想界也曾出现过群星，那末康、梁要算是相当璀璨的两颗，虽然，它们所发射出来的光芒没有持续多久便暗淡了。

由康、梁的一生事业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由得联想到康有为当年在广州长兴里创设的“万木草堂”。

广州，是中国近代被外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打进来的第一个沿海城市，也是最早的中外通商口岸之一，因此也最早受到“欧风美雨”的侵袭。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使得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学西方、找真理、讲新学、救中国的道路上得以开风气之先。

清末的广州，本是文风很盛的地方，著名的书院就有学海堂、粤秀、粤华、广雅和菊坡精舍等五所。这些书院的山长多是颇有些名气的“硕学通儒”，连总督、巡抚、学台到任，也都要去拜见，以示尊崇。康有为开设的万木草堂和老资格的五大书院比起来，无论在地位和规模等各个方面，都未免有些相形见绌。然而，要论它们

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和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那五大书院和万木草堂比起来，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万木草堂创办于 1891 年，当时康有为三十四岁，不但已经著书立说，而且在北京住过两年，交游甚广，并于 1888 年冬第一次上书清帝，请求变法。这使得他在当时的“公卿”“士林”中成为很有名声的人物。

梁启超之结识和师事康有为，是在 1890 年 9 月，通过他在学海堂的同学陈千秋介绍的。梁氏十五岁入学海堂为正班生，十六岁应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1890 年，他十七岁的时候，入京会试，没有考中，在归途中路过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学若干种，心好之”（《三十自述》）。这次入京，使少年英俊、颇为自负的梁启超大开眼界。学海堂所学的那些课目再不能满足这位求知欲十分旺盛的青年的要求了。恰好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这时已经拜见了新从北京回到广州的康有为，他向梁启超说自己从康有为那里听到了闻所未闻的学问，于是二人决计拜康有为为师。关于他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在《三十自述》中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述：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字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由此可见康有为对梁启超思想影响之大，梁启超对康有为学识敬佩之深。这次见面使康、梁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影响了

梁启超一生的思想行事。

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学生还不到二十人。其中大部分是十五六岁和十七八岁的青年。梁启超当时只有十八岁。规模虽小，但思想很新。教授的科目除了孔学、陆、王心学之外，还要学生们学习和阅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二十四史》、周秦诸子，以及佛学和“译本西籍”。而最为重要的课程，还是康有为讲述的“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的带有明显新兴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内容的政治课。康有为自己追述万木草堂教学生活时说：“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政，救中国之法”。（《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无论从教学内容和从师生们的思想倾向来看，与其说万木草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学校，勿宁说是康有为为了培育维新变法人才的“干部训练班”。

万木草堂是初生的资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充溢着青春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在这里学习的青年学子，有着发自爱国、维新的进取精神；有着探究真理、追求进步的炽烈热情；有着尊师爱生、团结友爱的活泼气氛。对于这种新的思想和学习生活，我觉得可以称之为“万木草堂精神”。

主持万木草堂讲席的康有为，虽然受到学生们的尊敬，但那时的康有为和后来思想倒退、僵化，变成保皇党首领的康有为却判若两人。他对学生并不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亲密无间，打成一片。梁启超后来回忆当时学习生活时写道：

吾侪初侍先生于长兴也，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六乃至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蹀躞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堂中有书藏，先生自出其累代藏书置焉。有乐器库，先生督制琴竿干戚之属略备。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欢喜踊跃，自以为

有创获，退省则醺醺然有味，阅久而弥永也。（《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康有为不但在讲台上为学生讲课，每天晚上，还要找学生谈话，有时几个人一起谈，有时一个人单独谈。谈话时先是康有为提问，学生回答。然后康有为便滔滔不绝地阐发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见解。如果学生有时提出疑问，康有为的兴致就更高，越发放言高论，海阔天空，古今上下，侃侃而谈。学生们也无拘无束，思想十分活跃。

万木草堂的校外生活，也是颇为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

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遘汎滥于宇宙万有，茫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上栖鸦拍拍起。嘻嘻！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矣。（《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除了讲课、读书、讨论和校外活动之外，康有为还和一些得意门生一起著书立说。陈千秋当然是康有为的一位得力助手，康氏在著书立说中“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梁启超为对康著《新学伪经考》担任校勘，并且参与了《孔子改制考》的编写工作。而在这时，康有为已经在向学生们讲他的大同学说了。

万木草堂从创办到结束，前后不过三年的时间，学生最多时也不过一百多人。但是它却培养出一批青年志士和学者，除梁启超、陈千秋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韩文举、梁朝杰、曹泰、麦孟华、徐勤等人，不过陈千秋和曹泰都死得很早，所以不象梁启超那样有名。

万木草堂虽然是个新型的学校，但它办学的目的和宗旨却是志在维新救国。梁启超追忆当年师生们慷慨国事的情形说：

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机隍，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歔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駭怪，指目之謚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梁启超为康有为作《七十寿言》，已经是1927年的事了。这时距创办万木草堂已有三十六年。这期间，康有为不但由维新派的领袖蜕变为保皇派的首领，而且后来又参与了张勋策划导演的宣统复辟，终于走到政治生涯的末路。随着思想的没落和政治生命的完结，在庆祝七十寿辰不久之后，他就与世长辞。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与乃师在政治上分途，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虽然几经得意，几经漂泊，又几经挫折，也终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出路。到了为他的业师作七十寿言的时候，这位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也已被动荡纷乱的政潮冲刷出去，退居为想要静穆而又不甘寂寞的“学者”了。他在缅怀三十六年以前的往事，追忆风华正茂的草堂生活，难免有抚今追昔、不堪回首之叹和对师友有某些溢美之词，然而，参照康、梁本人和有关人士的记载、回忆，他所记述的万木草堂和“万木草堂精神”，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当年梁鼎芬赠康有为的诗中，有句云：“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可见一班士大夫对万木草堂的赞誉，对康、梁一流人物的推崇。

对梁启超来说，他的一生学问、事业可以说奠基于一万木草堂，得教于乃师康有为。是康有为引导他弃旧学、向新学，开眼界、长才干，投身于维新变法。然而，也是康有为这位老师，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以“师道”之尊，百般束缚、控制梁启超的思想，使之不能摆脱保皇、立宪的思想羁绊。师生之间在1900年到1903年的几年中，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经过了反复地争辩、责难、

解释,最后还是梁启超向康有为就范。这固然有梁氏本身的弱点,但是与康有为的训斥、诱惑以至施加思想压力也大有关系。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章太炎比起来,可就大为逊色了。章太炎年青时曾师事俞樾,在“诂经精舍”治经学共八年。后来章氏投身于反清革命,引起俞樾的极大不满,甚至当面斥责章太炎“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对这位老师虽然十分尊敬,但对俞樾的斥责却毫不屈服,据理力辩。最后他写《谢本师》一文,宣布与俞樾脱离师生关系,表示革命的决心。他虽然敬重老师,但革命的意志却不为老师的反对所动,颇有些“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气魄的。而梁启超则屈服师道之尊,在本来有可能在政治上向革命转变的时刻,却被有形的无形的旧的传统势力之手,被老师和同学的保皇立宪之手拉向后退了。当然,章太炎在晚年,也失掉了写《谢本师》时代的朝气,变为颓唐守旧的人物。梁、章二人,在对待老师的态度上虽然不同,在思想境界上也有高下之分,但不能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继续前进,则是一样。历史的经验昭示人们,一个人如果要想挣脱传统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跟上时代的潮流,不断前进,该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啊!

万木草堂到现在快近一百年了。也许早被人们遗忘了吧,我想这是不该遗忘的,因为它曾是近百年以前中国思想荒漠上的一块绿洲,在当时曾起过耳目一新的作用。现在写中国近代文化史和教育史,应该讲到它,并且给以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如果“草堂”原址犹存,似乎也不妨适当修葺,设以标记,告诉后人:这里就是康有为当年讲学授徒的“万木草堂”。

一九八〇年九月

吴瞿安先生二三事

袁 鸿 寿

五十年前，我在南京念书。当时吴瞿安先生（梅）在南京与苏州两地教书。我们一些词曲爱好者在瞿安先生的倡议和带动下组织一个潜社。这是一个松散而自由的文学小团体，既不标榜什么，更不反对什么。不定期在南京夫子庙老万全酒家，每人出一块钱，为聚餐之醪。晚餐前集合在老万全后门秦淮河的船上。瞿安先生出题目，指定词牌或曲牌，然后焚一支香为时限，分头去做。交卷时写作者姓名于纸背。瞿安先生认真评阅，在卷上圈圈点点，选出最佳者三名，大家传阅。有时瞿安先生高兴，自己亦作一首。这种做法，有些像诗钟，寄感慨于巧思，时有佳句。谈笑既毕，酒饭而散。这样考试式的做文章，我参加过不少次数。每次都有活页的铅印，积多了就成为《潜社集刊》。后来我的兴趣转到历史方面，而且1930年大学毕业就出国了。所以潜社始于何时，终于何时，也就不问了。《潜社集刊》在文革期间抄家与其他书籍手稿一同散失。一九八〇年一月，我到广州开会，访晤中山大学中文系王起（季思）教授，谈起潜社旧友，存者无几，都是年逾古稀，除王与我之外，就他所知还有南京师院唐圭璋教授，中央美院常任侠教授，杭州大学陆维钊教授，其余就不知道了。同年四月我到杭州，才知道陆亦已逝世。瞿安先生的响影是多方面的，潜社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934年我从西欧归国，在南京工作。我与瞿安先生还有机会

见面。然而瞿安先生内伤了。每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骂。我扶送他回宿舍时，发现他内心的痛苦，十分难过。只有一次瞿安先生请仙霓社老伶工在苏州同乡会演“上路”“活捉”等折子戏，而以他自己的“湘真阁”压轴。那天晚上蔡元培先生也来观看。瞿安先生亲自导演，亲自招待，既严肃又欢悦。那天他没有喝酒。传字辈的伶工演得很出色，而瞿安先生还指出某个唱腔、某个动作还有不足之处。

1934 到抗日战争这几年，瞿安先生为什么如此痛苦，如此颓废呢？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第一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站在秋瑾一班人一边，痛恨清廷腐败，国耻连绵，而后来南社诸子都各奔前程了。他对革命本来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幻灭之余只得退到教学与研究曲学上来。第二是他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起来后，自己所守住的曲学堡垒也受到冲击而不得不从北京到南京。他对于“不通阴阳四声，不懂双声叠韵，认不得一两千方块字的浮夸之士”，居然“也作新诗，出集子”，认为不是进步而是倒退。第三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当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黄侃与系主任汪东都是章门弟子，自然瞿安先生处于下风。

抗日战争初起，南京中央大学决定内迁重庆。校方有一决定：凡不按时到重庆报到者作解聘论。瞿安先生到后方逾期了，校方竟把瞿安先生解聘。当然很多教师鸣不平，请他到沙坪坝。瞿安先生伤于酒，加上南行途中辛苦，一怒之下就病了。当时有一位同学是云南大姚人，愿意接瞿安先生到他家乡去供养。瞿安先生一因大姚安静，战火所不及，二因大姚天气温暖适宜养病，三因同学热情，生活有人照顾，比在学校方便，四因大姚是明李卓吾曾居官

之地，所以同意了。瞿安先生在大姚的工作是总结平生在词曲方面的著作，完成这项工作就去世了，家人无一在侧，死后亦无条件奔丧。一代曲学山斗，孑然一身客死他乡。

中央大学中文系老教授王伯沆先生以高龄患半身不遂，卧床不起，沦陷时住在南京存厚里老宅，贫至断炊。在贫病蛰居中，有一位同学把瞿安先生一首除夕七律寄给伯沆先生，当时伯沆先生不知瞿安先生已经逝世，在病床上和了七首：

方音何暇辨吾衙，野哭声中度岁华。亭下劳劳伤过客，尊前可可忆唐花。贫知到处居非易，老悟浮生住即家。地满干戈天满雪，危楼闲坐听萧笳。

——一叠——

胡蝶成团蜂作衙，相将空际闹春华。纵横污我奔车水，歌笑烦人堕溷花。未必桑中堪有喜，微闻江外欲无家。归飞燕子惊心甚，坏蝶犹然隐乱笳。

——再叠前韵——

平生未解是趋衙，梦里何曾录梦华。直以孤心比明月，惯携禅意看溪花。乾坤欲坏方知盍，风火能闲自有家。却笑衰翁穷不老，又来江上听羌笳。

——三叠前韵——

万柳摇天绿可衙，日长残卷对南华。化鹏击水心原壮，腐鼠骄人眼已花。果是螂且难别味，由来野马易忘家。剧怜羁旅江头客，一样临风数怨笳。

——四叠前韵——

忘烟断础指官衙，仿佛遗民识翠华。一片烧痕连野草，数椽破屋见邻花。摄身方叹身为赘，阅世真堪心出家。多少鸡虫争得失，不惊鼓吹但惊笳。

——五叠前韵——